

柳宗元简论

吴文治



中国文学史知识读物

柳宗元简论

吴文治

中华书局

1979年·北京

中国文学史知识读物

柳宗元简论

吴文治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 4印张 80千字

1979年5月第1版 1979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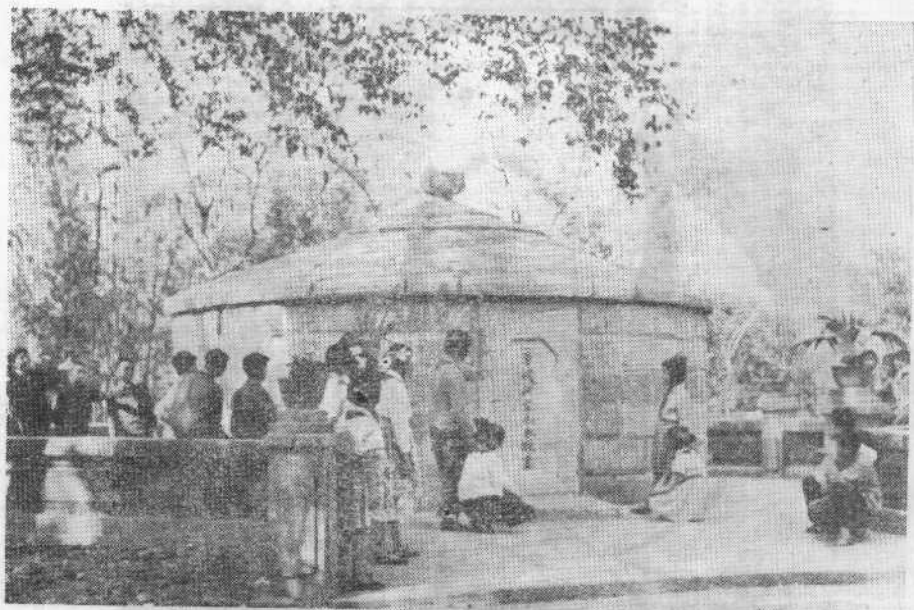
印数：1—51,000册

统一书号：10018·423 定价：0.26元



柳宗元像

据南薰殿旧藏“圣贤画册”复制



柳宗元衣冠墓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侯公园内

柳宗元墓

柳宗元墓位于柳州市柳侯公园内

目 录

一 时代	1
二 早年生活	6
三 政治革新活动	13
四 两度贬官	19
五 哲学论著	29
六 政治思想	39
七 文学理论	48
八 寓言	66
九 人物传记	77
十 《永州八记》	90
十一 诗歌	102
后记	122

一 时 代

柳宗元，字子厚，是我国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他生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七七三年），上距杜甫之死三年，距韩愈之生五年。从他出生到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八一九年）去世的四十七年中，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四朝。但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贞元、元和时期。这时，唐代社会经“安史之乱”十年兵革的摧残，为旧时史家所称道的所谓“唐代盛世”，已经完全败落。战乱、灾荒、统治阶级更加残酷的掠夺和压迫，使阶级矛盾显得异常尖锐。

安史乱后，以豪族大地主为阶级基础、以节度使为中心的藩镇军阀，依然拥兵割据，抗拒中央政令，大搞分裂活动。他们跨州连县，既有土地，又有人民，又有甲兵，又有财赋，俨然是与王朝中央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后来宪宗虽采用分化和征讨兼施的政策，使藩镇表面上归顺中央，但藩镇擅有财赋、拥有重兵的情况，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

宦官专权在这时更是一个严重问题。虽此事从玄宗时早已开始，但安史乱后，宦官就更加飞扬跋扈，中央大权都在他们控制之下。宦官掌握禁军，在德宗时便逐渐形成一种制度。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皇室感到手握重兵的节度使桀骜不驯，而一般重臣武将，也往往不听指挥，因此他们便确定把中

央禁军——神策军完全交由家奴宦官来掌管。宦官不仅掌握禁军，而且担任监军使。凡大小军营，莫不设有监军。同时，唐朝从中叶以来，便以宦官担任枢密使和宣徽使，执掌机要，传宣诏令，商议国家大事。这样，宦官就不仅拥有常备武装，而且拥有实际的政治权柄。这些原来是皇帝的家奴，因为直接操纵了中央王朝的军政大权，甚至连皇帝的废立、大臣的进退，也得由他们来决定。唐朝的皇帝，从肃宗起，差不多都经过宦官的拥立。顺宗、宪宗、敬宗、文宗就都死于他们之手。

在藩镇割据、宦官弄权的情况下，人民生活遭受了极大的痛苦。这时推行的“两税法”，原规定并田赋、户调与徭役为一，根据政府支出用途的需要，按照百姓的贫富定等第高下，分夏、秋两次收税。但藩镇州县多违法聚敛，所得赋税，往往“皆为己有”，不给中央“上供”（《旧唐书》卷一五六《韩弘传》）。这就使唐王朝仍然“经费不足”，“于是征敛多名，且无恒数”（《通典》卷七）。同时，由于商业经济已逐渐得到发展，政府需要货币，“两税法”规定一律收现钱，而农民生产的只有布帛五谷等实物，官吏任意折价，富商又从中取利，物贱钱贵，农民的实际负担增加了好几倍。而且，统治者为了打内战，无限制地扩大兵额，许多脱离生产的士兵，也要靠农民来养活。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从中唐的情况来看，也正是完全符合的。唐代额定官吏的数目，据《通典》所载就达三十六万八千余人，实际数字当远不止

此。而军饷的负担，在宪宗时，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人口，要负担八十三万军队的费用，平均不到两户供养一兵。宦官对人民的剥削，强抢豪夺，更令人发指。比如他们主持的所谓“宫市”，借着替宫中采购的名义，就可以随意给价。白居易在《卖炭翁》一诗中所写的：“一车炭重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正是当时宫市交易情况的真实写照。此外，如宣徽院五坊小使等宦官，他们为皇室饲养鹰犬，“所至官吏必厚邀供饷，小不如意，即恣其须索，百姓畏之如寇盗”（《旧唐书》卷一七〇《裴度传》）。又如奉使外出的宦官，可以随便抢夺路人鞍马，弄得“远近喧腾，行李将绝”（《旧唐书》卷一六五《柳公绰传》）。凡此种种，都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农民不胜其苦，纷纷破产逃亡，田园荒芜，千里萧条，江淮一带，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就在柳宗元出生前十年左右，江淮地区曾先后爆发了袁晁、陈庄、方清、许钦等领导的起义，延续“十余年乃定”（《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其中袁晁领导的起义军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时在陕南秦岭一带，也爆发了以高玉为首的农民起义，直接威胁着唐王朝的京城长安。在柳宗元一生的四十七年间，各地起义依然此伏彼起。他七岁那年，湖南有王国良领导的起义（《资治通鉴》卷二二六）；九岁，江南西道又有所谓“江贼”的活动（《资治通鉴》卷二二七）；二十六岁，栗辘领导的山越起义，“杀刺史卢云”，“攻陷浙东州

县”（《资治通鉴》卷二三五）。与此同时，四川、贵州、河南、广东、江西、安徽等地的农民起义也相继出现，接连不断。这些规模不同的农民起义，都直接冲击着封建的反动统治。

以上所述中唐时代这种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和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对于柳宗元的思想和创作，是有着巨大的影响的。在以宦官和藩镇为代表的豪族地主黑暗腐败的统治下，一些没有特权或者很少特权的中小地主，他们在政治上，社会地位极不稳定；经济上，也是豪强兼并的对象。同时，豪族地主的倒行逆施，激化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使中小地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见的政治家，逐渐感到了象征着国家统一的皇权所面临的严重威胁，他们需要対眼前已经腐败不堪的封建剥削制度进行某些修补，以解决如何防止“民变”的紧迫问题。柳宗元在顺宗时和王叔文等一道所进行的政治改革，以及他在此后所写的许多作品中所宣扬的思想，就正是他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产物。

唐代的社会思想，一般说来是比较自由的。先秦时期，法家学说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学说则是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从汉代地主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他们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便开始把儒、法、道三家学说混杂而用之。到汉武帝时，汉王朝统治已相当稳固。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了系统地解决从思想上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和从思想上加强对人民的统治，汉武帝刘彻深切感到儒术要比法术更有用，因而便尊儒术，任儒者，把儒家学说逐渐改造成为适合地主阶级统治所需要的意识形态。从此，儒家思想便成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居于绝对统治的地位。但是，这种情

况到唐代便有所不同。传统的儒家思想虽然在思想领域中仍有较大影响,但却并不象汉朝那样具有唯我独尊的统治地位。而法治思想,则为地主阶级中的有些较有务实倾向的人所重视,他们主张儒法并用,在儒家学说中,往往注入了某些法家的观点。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在这时也相当盛行。就道家来说,唐初最高统治者因为自己姓李,被尊为道教之祖的老子也姓李,因之大加倡导,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把道教尊为国教,列《道德经》、《庄子》、《列子》等为士子必读书。至于佛家思想,由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佛经大量翻译,上自皇帝,下至百姓,信佛的很多。当然,作为唐代社会庞杂的封建思想体系的主干的,还是儒家学说。但是,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的兴盛,都曾直接影响到唐代知识阶层的精神生活和文学艺术。柳宗元的主导思想是儒家,但他对释、道、法等各家也有所吸收。这固然是由于他所从事的封建政治和个人精神生活的需要,同时也正是当时社会思想比较自由的一种反映。

唐帝国在贞观到开元的一百几十年间,封建经济曾出现过繁荣昌盛的局面,科学文化也曾得到普遍的高度的发展。这个时代强大的国力,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在当时许多文学、艺术作品中,都曾有过鲜明而生动的反映。而商业和手工业的发达、市民阶层的成长、城市的繁荣,也都丰富了唐代文学艺术的社会内容。“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时代,虽然社会经济开始衰萎,但已经形成的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高潮,却并未因此而随之衰萎。相反,由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深刻尖锐,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更进一步地得到了迅速发展。因为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的矛盾,以及作家个

人政治上的不幸遭遇，使作家们直接或间接地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黑暗统治的不满和批判现实的精神。唐代文学在“安史之乱”以后所出现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新高潮，这与当时作家们在动乱的时代中所受到的社会现实的深刻体验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唐代在“全盛”时期出现了象高适、岑参、李白等富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大诗人，而到唐帝国急剧走下坡路、日益趋于衰败的中唐时代，仍能出现象杜甫、白居易那样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和柳宗元那样杰出的现实主义散文家，时代、生活对他们的培育和影响，无疑都是非常深刻的。

二 早年生活

柳宗元的祖籍是山西河东郡(今山西省永济县)，后来曾迁居江苏吴县。因为祖上世代做官，在京城长安的城内和郊外，也都有房舍和田产。柳宗元诞生在长安，而且是在长安长大的。人们称他为柳河东，他自己有时也说他是晋人，其实都不过是沿用他祖籍的习惯说法罢了。晚年他被贬谪在柳州，又死在柳州，所以人们也叫他为柳柳州。

据记载，柳宗元的高伯祖柳爽以上，四代都曾做过宰相。但是从他的高祖以后，官运便不那么亨通。曾祖从裕，曾为沧州清池令。祖父察躬，做过一任湖州德清令，后来便一直退居在江苏吴县。察躬有五个儿子，柳宗元的父亲柳镇最大。四个叔父虽也有官职，但都并不显贵。

柳镇在唐玄宗天宝末年曾做过太常博士。“安史之乱”爆发，他带着母亲在山西阳城县西南的王屋山避难，靠人家的支助维持生活。乱稍平，便携眷南下去吴县。肃宗李亨起兵讨伐安禄山时，柳镇曾几次上书言事，后来在郭子仪部下做了专管兵器的左卫率府兵曹参军。接着又多次调任，转辗南北，生活很不稳定。直到柳宗元的伯祖柳浑被德宗任命为宰相以后，柳镇才入朝为殿中侍御史。

柳宗元的母亲卢氏，是涿郡范阳的所谓大族，祖上也世代做官。柳宗元儿时的文化知识，主要是他母亲教给的。

柳宗元没有嫡亲兄弟，只有两个姊妹，大姊嫁给博陵崔简，二姊嫁给开元时宰相裴光庭的后裔孙裴瑾。柳宗元的堂兄弟比较多，单是在他诗文集里经常提到的，就有宗直、宗玄、宗一、谋、澥等五六人。柳宗元在堂兄弟中的排行是第八。

柳宗元的童年生活，史籍记载不多。他自己所作的《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中，曾提到他四岁时母亲教他读书的情形。在他父亲去吴县给他祖父守丧的三年中，他和母亲、姊妹都住在长安西郊。母亲教他读古赋十四首，他都能朗朗背诵。

他的少年时代，因时局动荡、家庭多故，遭到过一些险阻。由于他父亲的官职调动频繁，他曾随父亲去过一些地方，增加了社会阅历。

柳宗元十岁那年(公元七八二年)，柳镇正在安徽宣城做县令，发生了河北诸镇节度使大规模叛乱的严重事件，德宗想起兵讨伐，未能成功。后一年，柳镇调任为阆乡县令，柳宗元随父由安徽来到河南，这时长安又发生兵变，德宗皇帝仓皇出

逃，太尉朱泚自立为王。过了一年(公元七八四年)，柳镇又被调为鄂岳沔都团练使判官，柳宗元跟随来到湖北夏口(今武昌西)。朱泚之乱，由于李晟等起兵讨伐，开始得到平定，逃跑到外的德宗皇帝才重新回到长安。这些兵荒马乱的现实情景，柳宗元虽没有身历其境，但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贞元元年(公元七八五年)，柳镇因事去江西，柳宗元随父同行，曾在长沙游览。这时，因破朱泚有功而被提升为副元帅的李怀光，由于阴谋策反而为他的部下牛勣所杀。柳宗元虽在遥远的南方，但对此甚为关切。他写了《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愤怒地谴责“逆贼”李怀光阴谋叛乱的“凶险之行”，表达了他反对分裂、渴望国家统一的心愿。这篇文章，曾得到当时一些知名文人的赏识，因而使这个刚刚十三岁的少年便有了“奇名”。就在这同一年上，柳宗元和礼部、兵部郎中弘农(今河南灵宝县)人杨凭的女儿订了婚。

贞元三年(公元七八七年)，柳宗元的伯祖柳浑为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一年，柳镇便入朝为殿中侍御史。柳宗元随父回到长安，这时已十六岁。但柳镇到任不久，便因触犯奸臣窦参而遭到陷害。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陕虢观察使卢岳去世，卢岳的妻子独占家产，岳妻上诉，请求公判，御史中丞卢伋却颠倒黑白，反而要给岳妻判罪，侍御史穆赞因坚决反对，卢伋便与宰相窦参一起捏造穆赞受贿的罪名，把他捕送下狱。穆赞遭此冤狱，他的弟弟穆贲便继续上诉。柳镇和刑部员外郎李规、大理卿杨瑀受理这个案件，结果全部翻案，穆赞因而获释。但从此柳镇便遭到妒忌。由于窦参在德宗皇帝面前搬弄是非，德宗听信谗言，终于在贞元五年(公元七八九年)

将柳镇贬官为夔州（今四川省奉节县）司马。直到贞元八年（公元七九二年），窦参因得罪处死，才重新进京复职。柳镇那种“守正为心，疾恶不惧”的精神，对柳宗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柳宗元在父亲死后所写的《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还曾提到他父亲对他所进行的这一教导。

柳宗元的家庭影响，决定他从小就以读书做官作为努力的目标。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很多，但进士科考试却最为当时的读书人所重视。因为进士录取的名额虽比其他科少，却比较容易为统治者器重和赏识，因此擢用也比较快。唐代从贞观、永徽以后的许多宰相，就差不多都是从进士出身的。进士考试虽也要考《孝经》、《论语》等儒家经籍，但更重要的是考诗、赋、文章。因此柳宗元早年在学习上所下的功夫，重点还是在作诗、赋，写文章。现在柳宗元集子里所保存着的《迎长日赋》、《记里鼓赋》，就是他早年准备去考进士前的习作。这些作品，都是根据当时进士考试的要求，非常讲究文采的。柳宗元后来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他早年写文章“以辞为工”，以“务采色，夸声音”为能。这是符合他早年作品的实际情况的。

在唐代，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人，必须是学馆里选举的“生徒”；否则就必得由乡里保荐、州县甄选，然后才能赴考。经过后一种手续赴考的，叫作“乡贡”。柳宗元十七岁时，曾几次请求乡里保荐，但由于他父亲刚遭贬谪，未能获准。直到他二十岁，窦参处死、柳镇复职之后，才被选为“乡贡”。明年春上，他在长安考中了进士，和他同时考取的三十二人中，还有他的好友刘禹锡。柳宗元考中进士的事，曾引起当时许多人的注意，

连德宗皇帝也找左右大臣打听，知道他就是那个敢于触犯奸臣竇参的柳镇的儿子。

柳宗元考中进士的消息传来不久，同年五月十七日，他的父亲柳镇便在长安去世。次年，他去邠州（今陕西彬县）看望在那里做官的大叔父。利用这个机会，他广泛打听了当地已故循吏的逸事，详细调查了有关段秀实的生平事迹，为后来写《段太尉逸事状》积累了材料。又过一年，他在长安相处多年的好友韩泰也考中了进士。韩泰是个在政治上具有革新思想的青年，后来一直是柳宗元在政治舞台上同进退共患难的亲密战友。

贞元十二年（公元七九六年），柳宗元被吏部分发担任秘书省的校书郎，管理国家的经籍图书。校书郎的官职虽小，但从此他却开始插足官场了。这年，他和杨凭的女儿在长安结婚。过了两年，朝廷又举行博学宏词科考试。这种考试，在唐代并非年年都有，而且每次入选的人数也不过三五名。柳宗元在这次考试中榜上有名，立刻被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但这个职务实际和校书郎差不多，主要职责也不过是掌管编辑出版经籍，和搜集已经散佚的图书。他在担任校书郎和正字的这几年间，有机会博览群书，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同时，也有机会接触一般的朝臣官僚，了解官场情况。但这时与他交往最密的，还是他的朋友刘禹锡、韩泰、吕温、李景俭、崔群、韦词、李杓直等青年人。

柳宗元到集贤殿书院的第一年，京里便发生了太学生请愿的学潮，闹得满城风雨。事情是这样：朝里的奸臣裴延龄，和当时有名的宰相陆贄争权夺利，在德宗面前说陆贄的坏话。

德宗听信他的话，把陆贄和另外两个人张滂、李元的职务都撤掉，准备让裴延龄接替陆贄当宰相。谏议大夫阳城对此深为不满，公开表示反对。为此，阳城被降职为国子司业。后来，太学生薛约因议论这事表示不满，也遭到了贬谪。在薛约启程去连州(今广东连县)时，阳城亲自送他到郊外。德宗知道后，怀疑阳城私结朋党，因此又把他改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刺史。这接二连三的政治迫害，激起了二百多名太学生的公愤。他们以何蕃、季偿、王鲁卿、李谭等人为首，簇拥到皇宫延喜门前，齐声呼叫，要求德宗收回成命。当时皇宫前警卫森严，禁军撕毁了请愿的奏章，不予转达。请愿一连持续了好几天。柳宗元热情支持他们的这一行动，并写信鼓励他们，称赞这种行动是“奋志厉义，出乎千百年之表”，认为他们“服圣人之遗教，居天子之太学，可无愧矣”(《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当然，柳宗元这样赞许太学生们的行动，实际也还是从卫护当时处在尴尬局面的德宗皇帝的利益出发的。后来，阳城果然被贬到道州去了。此后不久，柳宗元因为对阳城的为人深表感佩，因此又写了《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对他备极称赞。

柳宗元到集贤殿书院的第二年(公元七九九年)，又发生了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的叛乱，他派兵在唐州(今河南泌阳县)搞突然袭击，将一千多名无辜的百姓裹胁而去。柳宗元对这种虐害百姓、对抗中央的分裂活动，感到无比愤慨。他结合当时形势，写了《辨侵伐论》，要求征募天下义兵，去平定叛乱，表明了他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

这年八月一日，柳宗元的妻子杨氏因足疾在长安去世。